



岭南社科名家文丛

李锦全

自选集

LI JIN QUAN ZI XUAN JI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李锦全 | 自选集

LI JIN QUAN ZI XUAN JI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锦全自选集/李锦全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3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岭南社科名家文丛)  
ISBN 978-7-218-05471-1

I. 李… II. 李… III. 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2317 号

|      |                                   |
|------|-----------------------------------|
| 责任编辑 | 陈启方 张小云                           |
| 封面设计 | 张力平 吴德灏                           |
| 版式设计 | 虹 峰                               |
| 责任技编 | 孔洁贞 周 杰                           |
| 出版发行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 印 刷  |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
| 印 张  | 26.75                             |
| 插 页  | 2                                 |
| 字 数  | 293 千                             |
| 版 次  |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218-05471-1            |
| 定 价  | 54.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q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qh.com](mailto:sales@gdpq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83799710(直销) 83790667 83780104(分销)】

##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

主 任：林 雄

副主任：蒋 斌 陈俊年 黄尚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桂科 朱仲南 刘 蔚 李子彪

李夏铭 张小杰 杨以凯 陈海烈

林海华 金炳亮 曾少华 颜泽贤

##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评审委员会

主 任：颜泽贤

副主任：梁桂全 蒋述卓 李 萍 王国健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仲兴 王利文 田 丰 叶汝贤

刘少波 张小杰 李恒瑞 李新家

陈长琦 陈海烈 陈鸿宇 苏立功

肖海明 陆家骝 罗必良 金炳亮

唐钰明 黄尚立 扈中平 蔡 禾

廖小健



李锦全

1926年2月生，广东东莞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多年来从事中国哲学思想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获奖专著（含合著、参加主编）、论文共17项，其中《中国哲学史》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获第九届中国图书奖，《儒家思想哲理化的历史进程》获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 出版说明

2004年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省委、省政府贯彻中央精神，随后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决定》。这两份文件极大鼓舞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启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作为贯彻落实两份文件精神的一项重大举措，2005年9月19日，省委、省政府在广州召开的全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工作会议上，隆重颁布奖励1992—2003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2004年度国家和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以省政府的名义奖励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在广东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这次评奖中专门设置了一项“特别学术成就奖”，18位年逾七旬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获此殊荣，他们是：张磊、曾牧野、张江明、王琢、梁钊、夏书章、陈锡祺、蒋相泽、吴宏聪、端木正、李锦全、高齐云、黄天骥、黄德鸿、赵元浩、曾近义、汤在新、桂诗春。这些老专家学者德高望重、成果卓著，在各自专业领域成为学科带头人、领军人物，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得到这样的荣誉，应该说是众望所归。

就在这次会后不久，省委宣传部主持召开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会议，决定编选

18 位专家的自选集，由省社科著作出版基金全额资助出版。这就是《岭南社科名家文丛》的由来。这些专家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要以一本书的篇幅，展现其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成就，并不容易。很多专家在多个领域均有所建树，一些专家同时撰写多种体裁的文章，有的还发表过外文论著。因此，我们与专家们达成共识，遵循以下原则编选：（一）每本书的篇幅约 25 万字，一方面体现精选精编的精神，一方面也使读者买得起。（二）只收论文和少量演讲稿、调查报告，不收中外文专著。（三）只选本人最有专长、最具影响的专业文章，不收其他领域的著述。（四）为保持本原特色、历史轨迹，所有文章原则上不作修改，但注明发表时间和原载报刊。（五）为方便读者阅读，对入选文章进行分篇类辑。（六）每人以第一人称撰写一篇学术自传，以展现其求学历程，总结其治学经验。

18 位专家大多年岁已高，有的行动不便，有的卧病在床，但他们都对编选工作极为认真，大部分专家亲自动手编选文集和撰写学术自传，有的专家与出版社的编辑反复商量斟酌，其认真态度、严谨作风，令人敬佩！为了抢时间，赶速度，我们尽量抓紧编选和编辑出版工作，还在第一时间为 18 位专家拍摄了肖像照片，但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高齐云、蒋相泽、端木正三位先生驾鹤西去，没能等到书的出版，我们留下的影像竟成为最后的资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原定 18 种书整套一次性出版，现改为分期分批推出，完成一批推出一批。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成立于1997年，是省委宣传部领导下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具体运作的一个评审、资助社科著作出版的机构，每一到两年评审一次，每次评出省内专家学者撰著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十余种。基金成立以来共评审和资助出版著作百余种，其中30多种图书荣获省部级以上各种奖励。这次集中资助出版省政府表彰奖励的18位著名专家的个人自选集，可以说是基金资助出版的一次创新。

丛书以“岭南”冠名亦有寓意所在。因为“岭南”已不仅仅是地域的概念，而且具有文化的意蕴。在当前形势下，岭南文化为我们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大省、法治社会、和谐广东，必将注入新的活力。为此，我们组织出版“岭南系列”，包括《岭南博士文丛》、《岭南社科名家文丛》、《岭南文化大讲坛系列》等等，力求打造成为文化大省建设中的一个文化品牌，希望得到社科界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和参与。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  
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  
2007年3月5日

# 学术自传：我与中国 传统思想文化研究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的烽火燃烧到华南，我的老家东莞县城沦陷。我当时12岁，刚入初中二年级，由于年纪小，没有跟随学校流亡，只好滞留家中。为避免敌兵骚扰，终日关门闭户。由于我没有年龄相近的兄弟姐妹，而家中古典小说及文史方面的藏书却颇为丰富，于是唯有自己读书。先是看小说《水浒全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继而读唐诗、宋词、汉魏六朝和隋唐的古文和骈文，并逐渐看一点史书和先秦诸子选篇。当时的情况，我后来写的《莞城旧事杂忆》诗中有所表述：“少小无知作顺民，胸中郁结向谁申。挑灯作伴唯书卷，闭户关门隔路尘。”还有一首《忆江南》词：“思往事，旧梦忆儿时，秋月春花皆过了，行云流水欲何之，无语笑书痴。”这就是我少年时的写照。

我闭户读了四年书，由于是离群索居，因而养成比较沉默并有点孤僻的性格，但学业上却有不少收获。我背诵了大量诗词，涉猎了文史哲即称之为国学的一些基本著作。四年后我复学，仍然读初中二年级，但前几年

的功夫没有白费，起码语文、历史一类课就不用花多少精力了。1945年，我读到高中二年级时开始分文理科，为的是准备高考。当时的风气认为成绩差的才入文科组，我对此不服气就入了理科组，补了两年数理化。到毕业时我的成绩平均分是全校第三名，靠的是数理化考到高分，但到高考时我的兴趣又不在理工科。1947年我选考广东文理学院的中文系和中山大学历史系，后两校都录取。一般认为入国立大学较好，由是我又与史学结缘。

我入中大学习的前两年（1947—1949），在国统区是社会动荡，人民生活陷入困境的年代。大学生一片反内战反饥饿的呼声，教授们有的还摆出衣物进行活命大拍卖。1949年元旦，学校文科膳堂悬一门联：“但愿来年菜有肉，莫如去岁饭掺沙。”我看后成一绝句：“缘何仓米尽掺沙，当事诸公赶快扒。但愿来年菜有肉，莘莘学子亦堪嗟。”由此可见当时大学生活的一斑。

我从读中学到入大学，经历了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中间还停学四年，可以说是饱经忧患。从中学到大学是人生学习的黄金时间，外部条件不好不能说没有影响。但是中国又有句格言“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对学习也未尝不可以这样说。我对青少年的这段经历，自问并没有虚度年华。越是艰苦越向前，后来我在学业上所以薄有成就，也在于早年比较能刻苦学习，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我仍然留校学习。1951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南大区文化部工作了三年。中间曾被选派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

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该班由中央文化部、中科院考古所、北京大学联合举办，导师多是第一流专家，同时重视现场教学和实习。故时间虽短，在学以致用方面却收获颇丰。学习结束后我又到长沙参加田野古墓葬发掘工作。1954年撤销大行政区，我又回到中山大学历史系。虽然从事的是中国古代史教学，但那一段考古的实践，对史学研究的充实和提高，我认为是非常有益的。

回到历史系工作后，先是搞古代史，继而主攻方向转为中国思想史。1960年复办哲学系，缺乏中国哲学史方面的教师，于是将历史系的中国思想史教研组调到哲学系，我也随之调动。我在哲学系已工作了四十多年，教学，科研，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主攻方向仍是中国哲学专业，这一点没有变过。中国古代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专业下面的两个研究方向。

从以上我的学习经历来看，我青少年时主要是停学在家闭户读书的几年，大量读古典小说、诗词等文学著作，虽然不求甚解，但熟能生巧，我早年就掌握了作诗填词和用古文写作的基本功，对国学常识和一些基本文献亦有所涉猎，为我后来研究历史和哲学思想史都有所帮助。由于古人做学问，往往是文史哲不分家的，所以要研究某家某派或某个历史人物的思想，不能指望只看他们的哲学论文和专门著作。如南京大学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从严格的意义说其中不少人过去并未被认为是思想家。我写了一部《海瑞评传》，海瑞是个政治实干家，没有写过多少哲学论著，只有根据其他方面的资料来分析。我还写过一篇《从政治实践中看林则徐的哲学思想》，主要根据是《林文忠公政书》。陶

渊明是个公认的诗人，而我却据此写过他的“无神论思想”。苏东坡是个兼综儒佛道的人，我就写过一篇《读东坡诗词论苏轼入世与出世思想的矛盾统一》。对龚自珍也用他的诗词材料论证他“思想矛盾的两重性”。此外，我还写过一篇《“命”与“分”》，是用清代小说的材料来分析宋明理学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影响。

通过上面这些例子，我只是想说明要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以至传统思想文化，固然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但也需要有丰富的文献知识。看来，具备文、史、哲的通识还是需要的。我国著名哲学史家杜国庠，他和青年谈治学经验时，主张“博而后约”。“博”意味着知识面宽广，才有比较有选择，在“广”中求“深”。胡适对青年谈治学时亦提出，“为学当如金字塔，要能博大又能高”。博大是专精的基础。学习前辈的经验，我愿与青年学人们共勉。

我个人的学术研究，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特点，是用“矛盾融合，承传创新”八个字予以概括的。我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从先秦各家学派开始，便具有矛盾的两重性。儒家学说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着意研究和解决人际关系问题，孔子的“仁”可以说是一种人际关系学。孔子对人们在人格道德上的平等要求，和在社会政治上对等级的维护，形成儒家在人际关系上的两重性思想矛盾。道家老子一方面对当政者展开猛烈抨击，另一方面又为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出谋献策，从而表现了道家思想矛盾的两重性。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子，他既提出“非命”，主张“尚力”，但同时又宣扬“天志”，倡导“明鬼”，构成思想上的两重性矛盾。法家固然尊君，

但君主也要依法行事，也有主张君臣合作共事的一面，仍然表现出矛盾的两重性。

先秦诸子在学术思想上开展百家争鸣，构成中国哲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但各家在争鸣中尽管相互间开展激烈的批评，甚至加以攻击，而相互间亦并非没有相同之处，即表现为矛盾融合论。

在先秦各家中，儒墨似是对立的，如孟子辟杨、墨，而墨家却非儒。但孟子也承认“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即是作了肯定。墨家讲兼爱，似是与儒家推爱不同，其实只是操作程序上的差别。儒家讲正己正人，推己及人；墨家在思维逻辑上却倒转过来，讲视人犹己，这和儒家的泛爱、博爱，实质上应该可以融合。杨朱的“为我”，讲的是“全性保真”，其实与儒家“独善其身”的涵义相近。孟子批评杨朱“为我”是无君，那么孔子讲“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讲“不得志，独行其道”，荀子更是讲“从道不从君”，不也是无君思想吗？儒家是有尊君思想，但到独善其身时，和全性保真道家式的个人修养却相当接近了。

道家老子猛烈批儒、法、墨各家学说，对儒家的仁义礼智、墨家的尚贤、法家的严刑峻法都加以反对。但其实各家思想之间，亦并非没有相通之处。道家倡导无为，而儒家以尧舜的垂拱而治作为最高的政治理想，法家的韩非也以舜奉事尧为君臣关系的楷模，其实也是对无为而治的肯定，可见在政治理想上也有相通之处。至于反对“损不足以奉有余”，则更是为道、儒、墨、法各家的阐释所认同。即使主张专制统治的韩非，也要求君主“内有德泽于人民”，如“与天下为仇，非全身养

生之道也”。这是对道家作出回应。

从战国末年到汉代，儒、道、法三家是沿着矛盾融合的路子朝前发展的。如荀子对“礼”的解释，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从礼到法成为儒法两家的连接点。韩非称德、刑为二柄，也是孔子宽、猛相济思想的发挥。汉代董仲舒讲德主刑辅的两手，形成儒表法里或称阳儒阴法思想。汉宣帝所谓“以霸、王道杂之”，并成为指导统治思想的汉朝国策。在其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法互补的统治方术一直流传不绝。

道法思想的结合，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如稷下学者曾提出过“法出乎权，权出乎道”的观点，韩非也提到“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明确讲道与法关系的，还有马王堆出土的《黄老帛书》，提出“道生法”的命题。这里以“道”为本，以“法”为用，法要遵循道的原则，汉初曹参等人执政时，推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就是道法结合思想的具体运用。

从汉初黄老之治的道法结合，到董仲舒儒表法里的儒法互补，中国哲学思想正是沿着矛盾融合的路子向前发展。佛教是外来宗教，汉代传入中国。东汉末年开始出现道教，奉道家老子为教主。佛、道加上儒家，世俗上称为“三教”，从各家教义来看，当然是有矛盾，但发展的趋向，仍是趋于融合。

牟子《理惑论》相传成书于东汉末年，是我国早期一部宣讲佛学的著作，书中一方面以道家思想去理解佛教，同时认为古代的圣贤君子，也有不同的志向和追求，只要是“不溢其情，不淫其性”，就可以说“其道为贵”。据此“修世事”的尧、舜、周、孔，与“无为

志”的佛、老，就能够融合而不应该互相排斥。

汉末到三国时吴国的康僧会，他编译有《六度集经》，宣扬“度世”思想。但众生如何才能得救？他寄希望于儒家的“仁道”，而救世又是自我解脱修成正果的前提。因此，他将仁道引入佛家教义中，说“诸佛以仁为三界上宝”，这样通过行仁道将儒佛教义加以融合。

魏晋时期出现代替两汉经学的玄学思潮。玄学家们“祖述老庄立论”，用来注释《论语》、《周易》等儒家经典。他们把《老子》、《庄子》、《周易》并称“三玄”，综合儒道两家的思想资源，用以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作为玄学主流派，由王弼“贵无”论的“名教本于自然”，到裴焯“崇有”论的“自然不离名教”，再到郭象的“独化”论终于论证了“名教即是自然”。其中心论题是通过“有无”、“本末”、“体用”、“动静”、“一多”等关系的思辨推理，来论证自然和名教的统一，即道家和儒家思想的融合，“儒道兼综”成为玄学的基本特征。

东晋时期葛洪作为神仙道教理论的奠基人，他所著《抱朴子》，自称其中所论《内篇》属道家，《外篇》属儒家。对两者关系，他说：“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这里所讲本末，大概也是体用关系。修道成仙是神仙道教的本业，但治世之道却自称是“尚儒术”，同时还要用“刑德以致治”，还表现出儒法兼综思想。

儒、佛、道思想的矛盾融合亦非没有波折，尤其佛属外来宗教，出家弃俗就认为没有君臣父子的关系，佛教徒不拜君亲，违反儒家忠君孝亲之道，这是封建统治者不能容忍的。唐初反佛的傅奕因此斥之为“无父之

教”。为缓和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和适应世俗的需要，佛教到唐代就明显向儒家所谓周、孔之教靠拢。如华严宗的宗密，宣称“佛且类世五常之教，令持五戒”，将佛教的“五戒”与儒家“五常”相比附，表示佛教徒拥护儒家世俗的道德观念。他们又宣扬《孝子报恩经》、《父母恩重经》，鼓吹“孝道”是“儒释皆宗之”。自是佛教的世俗化也就趋向儒学化。

关于佛教儒学化，如只将五戒与五常简单比附，佛教并未能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看来慧能创立的南派禅宗，可以算得上是佛教的中国化。因为它不是对儒家伦理的简单比附，而是对佛教教义自身作了新的解释。如称“佛者，觉也”。所谓求佛，只应“向心中求；皈依佛，就只皈依自性”。慧能常说：“一念吾如平，即众生自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这就否认了心性之外有佛，而直认个人心性为本性，并把心中求佛的过程归结为心性的修养与觉悟，这正是孔、孟儒学并为宋明心学所认同的观念，因此，慧能改造过的佛教才真正成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组成部分。

融合佛、老思想使儒学走向哲理化的是宋明理学。在唐代李翱开其端。他写了《复性书》，提出灭情复性的观点，是受了禅宗“无念为宗”说的影响。他用佛学来解释《中庸》，将儒佛思想结合起来，实开宋明理学将儒学哲理化的先导。与此同时还有柳宗元，他是站在儒家立场提出“统合儒释”，这是取其释与儒合的一面；将佛教的“出世间法”与儒家的“独善其身”相结合，这是儒释兼综的一种类型。当时儒佛合流的情况，白居

易曾指称：“儒门释教虽名教则有异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也。”宋明理学与道佛思想有密切关系。作为宋代理学开山的周敦颐，他写的《太极图说》虽是标榜《周易》的阐发，但陆九渊却怀疑周说以无极加于太极之上，认为不合儒家宗旨。此点虽经朱熹辩解，并不能完全否认周敦颐思想与道教的关系。对朱熹本人，也有说他是朱子道、陆子禅，即认为朱、陆思想会受到道、佛的影响。另外，作为宋明理学理论基础的“理一分殊”学说，与佛教华严宗“一多相摄”的观点近似，这一点朱熹亦不否认。朱熹关于“理”的理论，也是近似华严宗的“理事”说，采取佛学的思辨形式，为儒家的伦理哲学作论证，这是儒佛思想深层次的融合。从儒学思想的哲理化的过程来说，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学是在承传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宋明理学被称为新儒学，即是把中国传统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从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到汉晋隋唐逐渐形成的三教并立，再到宋明时期理学的兴起，对佛、道吸收其思辨性的一面，使儒学走上哲理化的途径，这才是真正将“三教”的思想加以融合。正是经过长期各家各派（包括外来文化）思想的矛盾互补，构成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这里有它的时代性，即随着历史的发展，各个时期形成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的时代特点。另一方面也有它的民族性，即逐步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不同于西方，亦不同于印度的中国特有的文明。矛盾融合，承传创新，我认为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